

畅销近一个世纪的传记经典，史上最具争议的李鸿章传奇。



李鸿章 回忆录

〔美〕曼尼克斯 著
韩利利 陶林 译

親歷
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非虚构

李鴻章 回忆录

[美]曼尼克斯 著
韩利利 陶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鸿章回忆录 / (美) 弗朗西斯·曼尼克思著; 韩利利, 陶林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399-9861-9

I. ①李… II. ①弗… ②韩… ③陶… III. ①李鸿章
(1823-1901) — 回忆录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037 号

书 名 李鸿章回忆录

著 者 (美) 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译 者 韩利利 陶 林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861-9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晚清奇局中的李鸿章

陶 林

一部晚清史，或许就可以浓缩为一部李鸿章的个人回忆录。李鸿章出生在晚清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他个人的致仕与家族的发家，与晚清时代中国国运的盛衰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知李鸿章，则知晚清。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晚清其实很近。历史的轮廓与如今相形也并不差很远，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有时候，多多益乱，只因为太近，太多的眼皮子底下权变的干扰，反而让人有太多的误解。

李鸿章，是晚清时代之象征人物。凡是见李鸿章其人，或有文字书其貌的，无不谓其相貌堂堂，目光有神。就我们所见李鸿章遗留的相片，目光之炯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的确，在晚清时代的凋亡朝廷中，就眼力而言，李鸿章在昏鸦一片的官场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早年，他认准要靠读书出人头地，没有像很多平庸不堪的“官家衙内”们那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深得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读书之际，受父亲之命，拜师于曾国藩门下。曾国藩，



李鸿章的油画像

是晚清时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君子，殊为严厉，对子弟读书做人的要求很高。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要超过他一生中任何一个人。曾国藩的眼量，几乎是整个晚清时代最高的一座峰，李鸿章投于他门下，得以登其峰而望，眼力的提升自然不同凡响。待太平军兴起时，李鸿章果断弃文从军，师法老师曾国藩，操办起淮军，保有绝对实力，也是对时局变迁的远见所系；等到掌握了国政大权，李鸿章清晰地看到自己“居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便全力操办洋务，努力搞“沟通外交”与“和谐外交”，渐渐有了世界文化潮流的眼力，已然是晚清时代一流中国官员的典型象征，也是晚清朝廷文化的亮点之一。

可惜，纵然目光如此炯然的李鸿章，在不断衰败的晚清时局中，终不免沦于老眼昏花，左右不能力支的境地。甚至都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糊裱匠”，仅仅勉强支撑应付罢了。成也有眼，败在无力，这是李鸿章的天命所系，也是他“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原因所系。

李鸿章究竟是何许人也？当年，在曾国藩的老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是一个喜欢赖床睡觉，怕开早会，眼高手低的幕僚；在恩师曾国藩眼中，李鸿章是个可造之才，但是“拼命喜欢做官”；在同阵营的宿敌左宗棠眼中，李鸿章是个聪明取巧，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能无力的十足废物，“十个法国将军，抵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在维新派政敌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自视甚高，但一步雷池不敢越过的老朽；甚至，在顶头上司慈禧眼中，纵然不断夸奖李鸿章有“再造玄黄”之功，但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聊起他时，也忍不住说：“（湘军）剩下的臣子，李鸿章这些也是好的，只是因循得多。”

显然，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以来并不十分待见这位前清的“一等忠肃伯”。原因无他，此人位高势众，名大权重，但对中国近代史并未作出何等卓越的贡献。

晚清至今，中国的确居大变而不自觉。可很大部分人不过因为私利所驱，依然活在王朝轮回的宿命感观中。晚清，是一个即使没有外国干预，也逐步走向衰亡的时代。老态龙钟的王朝病，极为严重地困扰着

那一整个时代。曾国藩的湘军本意欲“另起炉灶、重开世界”，阻止因文化的衰退导致的“文明的自杀”。由李鸿章继承这笔遗产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做到“重开世界”，反而越搞越糟，不堪重任，吐尽气血。

这一点，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看得更仔细。有日本学者指出，李鸿章是一员福将，他的眼力带着他跟随曾国藩走一条革新开化的开放道路。他的好运气、好“福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直伴随着他。李鸿章是旧体制的优等生，出身资源优渥的官僚家庭。早年，他少有挫折，平步青云，是步步受惠于父兄及师长。父亲李文安苦心孤诣，把他托付给身为同榜进士的大儒曾国藩。这一番托付，把李鸿章放到了命运的过山车上，直抵好运气的顶峰。他步步效仿恩师曾国藩，办团练，拉拢、利用外国雇佣军，打太平军，办洋务，像当代诸多“官二代”那样，什么好处都被他不费大力气地占尽了。这位文忠公，聪明异常，是天生做官向上爬、混人情场的高手。同等利益，别人要十分努力取得，他似乎都是得来不费功夫。可以说，“无有曾国藩就无李鸿章”，这是一点不为过的。

中年得志而俯瞰苍穹，李鸿章比同时代人有更好、更开阔的视野。他比许多人更深刻意识到中华的变局，但也比许多人更乐意抱着“宁守旧而死，不开新求活”的态度。所以说，李鸿章并不是历史大变局中的主角，或者用英文单词表达，“HERO”，一时之“英雄”。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者，创造时势也。”什么都准备好了，让你去做，不过一介“归命侯”而已。英雄，你要自己造天地的。所以说，对于历史，李鸿章是一个本不该赖得太久的过客，却伴随着晚清始终，硬生生在曾国藩夭折之后，赖成了舞台主角。

面对变局一定要有大眼量、大心胸和新道德，这些，李鸿章都不具备。他只知其变，不知其所以变，变成何。在历史的褶皱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却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有生之年，他一直力图把老师曾国藩未竟之事业继续下去，却不得不受旧体制的一再掣肘，而终多事无成。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充其量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一个“糊裱匠”而已，在旧体制中，聊以糊裱一些新花样。

他的这番立意,显然,与他老师曾国藩所开创和展望的“采西气补充东气”的格局相距实在太远。

当然,比喻永远只是比喻,李鸿章也并非真是一个“糊裱匠”。他是一个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重臣,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能做成旧历史中的“人杰”,具备旧时代成王成侯的一切能耐,也保有充沛生命力和意志力,有一颗走向世俗人眼中“成功”的雄心。但他却无能无德于新的历史时代,无疑是新时代中的“婴儿”、“多余人”。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对之还毫无自觉,总是把自己的局限归罪于运数的不济。

其实,对于晚近中国,文化、文明体制的变异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却也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图伟业。世界近代以来,有两百余个国家地区,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从欧洲到中东,从非洲到东南亚,从美洲到澳洲,并非中华一家门店。在亚洲诸国,也还有印度、土耳其、日本、朝鲜等诸国的种种成败故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在做这些事。有些国家干得漂亮,有些国家干得拖泥带水。而像中国这样,文明与体制紧密关联的“老大帝国”转型殊为不易,需从文化入手,经由器物、人心、风俗等的多重变易,才能有所斩获。英雄要做的,无非是把这种变易放置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轨道里,而不能让它循环于老死——至今,对于中华而言,这件事依然还在路上。

李鸿章步步紧随恩师曾国藩,谨守臣道,拘泥不化。有历史学家称他是“内侍昏君、外御列强”,话是不错的。李鸿章对内要极力讨好的那位昏君,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的老女人,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若论起“昏君”,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昏君——不过,在王朝体制中,产生明君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人断乾坤,何其之难。慈禧从宫闱的倾轧之中走出来,浑身上下丝毫没有求新的意图,甚至连一点文化与文明的气息都没有,一切不过是随心所欲的权变。在她手上,所谓“传统”也不过权术耳:汉官可杀,满官可杀,维新派可杀、守旧派也可杀,主和派可杀,主战

派也可杀……一言概之，因私害公，瞎指挥，胡折腾。一部晚清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她“老人家”随意折腾的历史。

李鸿章对“老佛爷”倒真是忠心耿耿，却不敢像曾国藩那样坦率认定“两宫太后聪明有余、见地平平”，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心态待之。比起曾国藩那样纯粹的书生，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封建官僚，他把自己的荣衰和大清王朝的末途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可以很好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擅长于坐享旧日之利，而百折不肯图变。这就是任何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说不动他的原因所系。

在《红楼梦》这部预言中国末世文明境况的天才之作中，李鸿章的形象早已被曹雪芹先生深刻地勾画出来——就是那位“端方四正”的贾政老爷。梁启超说李鸿章“待人颇有傲气”，倒很像是总端着个架子的贾政。他终日里要周旋的，不过是要在牌桌、酒席上享清福的贾母——毫无疑问，也像极了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慈禧太后。如贾政一样，李鸿章心力憔悴，自认为还算正直与努力，但已经难以挽大厦之将倾。

所以，李鸿章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他有好心，有眼力，有一定的手腕，但是没有新时代所召唤的大学问、大见识、大心胸与大能耐，诚如史家所评的“志大才疏，亡国之丞，何堪称能，先拒疆防，又断海防”。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给李鸿章做翻案文章，我觉得是不足取的。与他生前所承受的殊荣、福气和权势相比，功德皆空的李鸿章，死后倘给若干差评，并不为过。

韩利利女士和我所翻译的这一部《李鸿章回忆录》，经过仔细研究，已然被认定是一本伪托之作，一部可以归类为“小说”的作品。虽说李鸿章学曾国藩甚多，但他并没有像老师那样做好“日课”，也没有记录日记的习惯。他好功业，好做官，好发财，贪恋权势，但疏于自修，受不来一个严谨书生那样太多的约束，所以并无资料显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美国记者曼尼克斯号称从翻译成英文的李鸿章日记、资料里整理出来的这部回忆录，显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但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这部书，清晰可见美国人对于李鸿章的亲感和好评。这种

友善态度,其实时至今日,还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情感的主流。

一派纯然天真的美国人,是难以猜度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官场中的那些老江湖的。他们即便英姿勃发,也骨子里老气横秋,人情世故文章做得太深,便人生如戏,也入戏太深。看这部书稿时,我更相信作者是在塑造一位理想中的英雄,一位类似后世的马歇尔或者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英勇、爱国的美国将军,而非一个中国满清朝廷的权臣。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他来了解李鸿章。正如柏拉图在书中所虚构的那个苏格拉底,同样能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一样。在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李鸿章生活的轮廓,看到大洋彼岸另外一群人对他的赞许与肯定。我想,或许李鸿章本人比任何人都喜欢这部恣意虚构的回忆录,并喜欢那里头所写的那个李鸿章,相信那真的就是他自己。

能和我的妻子韩利利女士共同翻译这部奇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作为一名资深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她对英文原著的严谨把握,保证了翻译的“信”与“达”,也带出了我这个学生。当我们一起修订好书稿时,满怀欣喜地期望着为世界送上一份崭新的礼物。

且向冥冥中的传主与作者致敬,只因为文化的传承,我们之间传递着微妙的因缘。更要向读者们致敬,你们的阅读,慰藉着我们一年来的辛劳;你们目光锐利的批评与指正,促进着我们的成长与丰富。

原编者前言

关于本书——《李鸿章回忆录》

与其说《李鸿章回忆录》这部书是笔者在自抒己见，不如说他是在替李鸿章为自己辩护。当然，传主李鸿章本人也很乐于为改善他的国家和民族而进言。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这份译稿的很多内容，是首度公之于众。

李鸿章不是一个心思仔细的人。当他北上天津时，大量手稿被遗留在了汉口。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又将二十四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遗留在了天津。直至李鸿章去世后，他那位在两广地区做官的侄子，才从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陆陆续续收集在一起，并存放于李鸿章在广州的故居里。

大约是在两年前，即 1911 年左右，经大清国政府准许，并征得李鸿章遗产托管者和继承人的同意，我们才得以着手研究李鸿章的资料和笔记，并委托曾在李鸿章身边做过英文秘书的罗伯斯上校将它翻译出来。协助他完成此项工作的，还有一位曾追随过李鸿章的幕僚——王秀才，还有广州城的一位老员外。

李鸿章的日记有洋洋洒洒一百六十多万字，他所做的笔记也是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只摘选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同时这些日记也是首次与英美读者见面。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有时会在单独的大主题下，设置出不同的小标题。事实上，原稿中的主题纷繁芜杂，而且喜欢做微言大义。在某

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一行字就概括了一群人,陈述了很多事。而此后,当李鸿章在另一个地区担任不同职务时,他又会把这个主题重新提起,这时他会就此写上三页、五页或者二十页。再后来,时过境迁,他又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同一个主题。

因此,将李鸿章的全部手稿结集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方式,是对他的日记和其他手稿加以筛选,并冠以恰当的标题,同时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们在将李鸿章的优美文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太多困难。然而,译者们在确定日期这个问题上,却变得手足无措。在早至他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一直采用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甲子周期和帝王年号纪年法,并在手稿上做了大量标记。就连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困惑不解。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删掉很多日期,并一致认为,如果想把写作每个条目的确切日期弄清楚,即便交给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专家,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1870年以后,尽管李鸿章大体上采用了现代的书写方法,但是为某些条目和手稿标注日期时,他还是会走极端,比如他这样写道:

“光绪某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未时。可恶的一年。”

——他会用这种方式记录不太重要的想法,但是完全忘了标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历史资料,可能会激起全世界的兴趣。但凡出现类似情况时,我们尽力都会把日期补上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与李鸿章一生的某个阶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刻意去提高或降低《李鸿章回忆录》的政治、历史或文学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单薄的容量,无法囊括李鸿章所写的,涉及不同主题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但是,编著者如此选择的目的,志在于收录那些他认为最有广泛和持久意义的文字。

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1912年12月1日,上海

原 序

《李鸿章回忆录》的意义

——美国国务卿眼中的李鸿章

(美)科士达^①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这在十九世纪末的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不少颇具影响的诗词作品；作为军人，他参与过许多次重要的战役，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作为政治家，他在地球上这个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连续三十年身居高位；作为外交家，他成绩斐然，有资格跻身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际关系专家之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国诞生了许多学者、若干的将军、若干能力出众功成名就的政治家，以及为数不多的一流外交家。但是，我们挑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像李鸿章这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卓有建树，并拥有极高的造诣。

正因为这样，我们为能整理出这样一本回忆录而感到高兴。它是从李鸿章篇章繁多的日记中精选出来的。这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我

^① 译者注：科士达，曾任美国哈里逊总统时的国务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北军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曾担任美国驻墨西哥、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公使。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科士达与李鸿章有深厚的友谊。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期间，他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一直在清廷和日本两国之间进行斡旋。

们可以通过它更好地了解李鸿章的性格和事业。

想要公允地评价一个人，必须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此，依据欧洲或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判断李鸿章的个性和成就未免有失偏颇。李鸿章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教育，自小耳濡目染“四书五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鸿章的生活范围完全限于中国国内，他只能通过鱼龙混杂的通商口岸去了解西方文明。

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不得不面对极端顽固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与那些对外国心存偏见或一无所知的同僚共事。他生长在乡下，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门第算不上高贵。李鸿章的父亲属于乡绅阶层，苦读多年后，考取进士，官位也并不显赫。他未能给自己的儿子提供飞黄腾达的条件，只能让李鸿章寄希望于科举功名。李鸿章科场一路顺利，最终从两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中进士，点翰林，风光无限。

因此，李鸿章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并以智者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他被同僚们公认为一流的大学士。他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在大清国广为流传并颇受好评。李鸿章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学造诣，即使到了晚年，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外，他最大的抱负，仍是想获得中国“桂冠诗人”（诗坛领袖）的美誉。

早年，李鸿章一心只想从事文学。但是公务缠身注定让他的期望落空，并将他的生活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在李鸿章博取功名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兴起到全国的地步。这次农民起义，在他上学堂时就开始的。几年以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动荡的形势反而愈发严峻，甚至引起百姓的恐慌，冲击了清廷固有的秩序。

就在李鸿章从京城回家之时，他与太平军擦身而过。他们已经攻取了南京，正斗志昂扬地向京城进发。当李鸿章发觉危险将要向授予他崇高荣誉的朝廷心脏逼近时，他的忠义之情被激发了出来。他立即响应圣旨，着手筹办团练招募乡兵，攻打并侵扰太平军的后方。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道的：“所有人都知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用老祖宗的话来说，我是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似锦前程……可这是

写诗的时候吗？这片土地里满眼都是水深火热、战乱纷纭，谁会在乎写诗呢？”

接下来的四年里，李鸿章积极参战，并初步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所率领的军队，不断给太平军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筹建了“常胜军”的美国人华尔，与他并肩作战。华尔在战场牺牲后，戈登将军继任为这支军队的管带。李鸿章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后者，他不仅非常赏识戈登的才能和战绩，而且对戈登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也了如指掌。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频，那些年，李鸿章一心报效朝廷，一直专心在南方指挥军队作战。后来，天津发生涉外纠纷，法国威胁要与大清国交战。于是，朝廷才把他派到天津应对危机。凭借其超群的军事才华、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李鸿章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被赐予史无前例的至高荣誉——清政府不仅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还指定他为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并加授一等肃毅伯。这些高级头衔，使李鸿章一跃成为清政府的头等要员，并持续三十年，直至他死亡。

李鸿章大半生在天津履职尽责，有二十四年。其间，他时不时地去北京公干。因为身居高位，且工作的地方是靠近京城的港口，在为与世隔绝的皇帝站岗放哨的同时，李鸿章也有机会接触到和各国政府有联系的各色人物。作为清政府外交部门的实际领导者，李鸿章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与训练有素、精明透顶的欧洲外交官相媲美的。事实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李鸿章总是能在谈判过程中赢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和尊重。

与李鸿章同属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从外交的对手那里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在与英国人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他既实现了大清政府的要求，又表现得相当坦率公正。威妥玛爵士曾经说过，只是由于认可李鸿章在交涉问题时所表现的率真，他才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在调停 1885 年中法冲突时，法国公使在和约中加入了这样一条：“法国声明放弃索要赔款，为的是向李鸿章阁下充满爱国主义情怀

的智慧致敬。”

1895年,日本政府拒绝了大清政府首批议和专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告知清朝政府,如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他们将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他。日方对李鸿章的品格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在准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期间,俄国沙皇亲自电告清朝皇帝,请满清朝廷委派李鸿章为特使前来朝贺。有人便谴责李鸿章受俄国的影响过深,有人甚至断言他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因此才会如此受其重视。而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将让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因为它清晰地表明:李鸿章正确地识破了俄国政府的阴谋,并清楚地掌控着局面,表现出全面而伟大的爱国情怀。

在一个追名逐利、把做官当成进身台阶的氛围中,一个大部分人都喜欢用公共的职位来获取权力、装饰门面的国家里,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有几个敌人也是很正常的。读了李鸿章的日记,我们就能知道,他对手众多,一些人甚至与他势不两立。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把他看作是最有能力的高官,并且非常地尊重他。这一点,在他庆祝七十大寿时可见一斑。当时,皇帝赐给他丰厚的贺礼,并亲笔题写了赞词。皇太后和亲王们也争着给李鸿章送礼。大小官员和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慷慨地奉上礼物;按照老规矩,寿日那天,他大摆寿筵,贺寿的队伍浩浩荡荡。祝寿活动的高潮,是大清国的高官们在张之洞写的寿序上签名。

张之洞的尊贵地位和影响力,在清朝仅次于李鸿章。虽然,两人也常有政见相悖,但张依然很尊重李。作为中国颂词的范本,现摘录张之洞寿序中的一段,大意如下:

“您的一切令人钦佩:深邃的著作、惊人的战略、敏锐的洞察力,禀赋卓越,不可动摇……在翰林院时,站在您身边,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在处理两湖重大事务时,我与您相比较,深感能力有限。我们全心地信任您,我真心地向您学习。与您相比,我是普通农夫之于最好的神箭手,拙劣的璞玉之如斧钺。您是国家之栋梁,

民众之期望，如柱石擎天，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君王所赖，如姜尚子牙，万众敬仰！”

尽管在政治生涯中，李鸿章总是想扮演一个严肃无情的角色，好像那尘世间的生活，他漠不关心。但是，在日记的很多地方，却流露出他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本性。他对母亲的挚爱令人感动，李鸿章母亲生活在一个偏远的省份，身患重病，即将离世。那时，李鸿章正在天津忙于教务。他便向摄政的皇太后请假，希望回到母亲的病榻边，他说：“十三年前，我和母亲道别之后，一直未曾谋面；现在，母亲已八十三岁高龄了。她老人家身体不好，因时常想念不在身边的儿子，病情日益加重。闻听此事，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恳请恩准回家探母。”

最终，朝廷只给李鸿章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他在出发前，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于是，李鸿章请求在家丁忧三年，但是慈禧太后说，国务繁忙，只能允许他回家一百天。由于没有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李鸿章悲痛不已。他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奏折的大意是这样说的：



“懊悔之情将萦绕我终生，于私，心中的伤口隐隐作痛，一刻都不能得以缓解；于公，这种悲伤令我无法再为国家效力……尽管天人两隔，无颜与母亲再相见，然而我会用三年的时间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哀悼。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我的灵魂从无法尽孝的心酸和无以言表的悔恨中解脱出来……”

多年后，即便李鸿章专心忙于公务，在母亲逝世十四周年忌日那天，李鸿章还是把自己锁在家里，谢绝了所有的访客。他写道：“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烦恼哀伤也好，欢乐荣耀也罢，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不会忘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

此外，李鸿章与皇太后慈禧之间非同寻常的通信，展示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孝敬父母。这种特征已经被神化为宗教性质的崇拜，同时也对人际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就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家长，如果基督教国家的人，也能像中国人实践儒家的核心学说那样，忠实地遵守《摩西十诫》第五条的规定（译者注：《圣经》上，摩西十诫第五条内容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西方的社会秩序将会极大地改良。

在战争期间，我们在李鸿章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这位威严的将领站在行将就木的美国将军华尔的身边，当看到一个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外国战士就要为清朝死去之时，泪水滑过他的脸颊。在他担任总督期间，直隶和周边省份遭遇了可怕的饥荒，他的同情心也在这时显现出来。为了阻止灾难肆虐，他积极参与救灾，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努力、经济实力和慷慨救济灾民的方式显露无遗。他除了向普通百姓和慈善组织捐款，日记中还表明，他每天会向一两千饥饿的灾民提供吃喝，并自掏腰包，解决附近村庄差不多五千人的伙食问题。“母亲每天都在鼓励我这么做。她说，佛祖和穷人不会忘记我曾经布施救济过穷苦人。”